

由圣到俗的转化

——对《圣经》《诗经》中各自民族心理特性之透视

范 玉

(菏泽师专, 山东菏泽 274015)

摘 要:本文试从《圣经》《诗经》诗歌侧重颂圣、关注政治现实、抒发个体情感意志和张扬理性等层面来透视在由圣到俗的转化过程中两个民族所展现出的各自心理的特性及其联系和差异。

关键词:圣化 情感意志 张力结构 理性张扬

中图分类号:I 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318(2001)01-0020-05

《圣经》与《诗经》诗歌各自作为完整的有机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推进衍变,希伯莱民族自公元前 12 世纪出现到公元 135 年作为独立的民族消亡,《圣经》作了历史的记录;汉族周初至春秋中叶(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6 世纪)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诗经》中则有形象的表现。《圣经》诗歌的作者由国王、社团领袖、流浪汉、劳动者组成;《诗经》作者也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二者反映时代特征的一致性及其作者基础之广泛性与相似性,对于解构希伯莱人、周人各自的民族心理特性,展示各自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心理提供了完整、真实而有意义的基点。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①,以内容的历时性为标准来看:《颂》为祭祀乐歌,多歌功颂德,产生较早;《雅》多为规劝君王针砭世事,产生较晚;《风》为下层人民心声的反映,较《颂》、《雅》成形更晚。对于《圣经》诗歌:

按文体区分,希伯莱书面文化遗产分为诗体书卷和散文书卷两大类。诗体书卷指《圣经》中的《诗篇》、《哀歌》、《雅歌》、《约伯记》、《传道书》、《箴言》、《次经》中的《便西拉的智慧》和《伪经》中《所罗门诗篇》等卷。^②

《诗篇》共收入各类诗歌作品 150 首,大多表现希伯莱人的宗教生活和情感,多对神的赞颂与敬畏,产生时间较早;《耶米利哀歌》、《雅歌》产生于“巴比伦之囚”^③时期。《哀歌》是《旧约》中描写最凄惨、情

调最悲切的抒情诗,作品分为 5 章,以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众民遭掳掠的历史惨剧为背景,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的亡国之恨与忧民之情。据传为大先知耶米利所作。先知原意是神的代言人与祭司本体相同,更多关注现实,内忧外患使他的言行多少带有革命导师的色彩。一方面遵循主的旨意只求顺从;一方面又代民请命。先知的导下——引导信徒与达上——告知上帝的双重角色的沉重与挣扎在《雅》中多体现在中国士大夫的苦心与无奈上。《雅歌》是极负盛名的爱情诗集,最初可能是婚礼庆典中演唱的诗歌,以美丽的意象,抒发男女慕悦、依恋、相思之情。但“据考,古时西亚某些地区的新婚庆典连续举行 7 天(或 14 天),期间新婚夫妇把自己扮成国王和王后,载歌载舞”^④通篇虽无宗教气味,却侧重了对政治现实的关注;《箴言》、《约伯书》、《传道书》则是站在理性与经验的角度,既非《诗篇》中神选子民的高贵,也非先知的沉重。《箴言》是一部由数百首短诗汇编而成的哲理诗集;《约伯记》的主题是探索人类悲剧命运的根源,以一个倍受磨难的人的诉说,对世界秩序的完满发出疑问,对“上帝的公义”提出质疑,上帝已不再是“众人不可仰视他的目光”的完美化身;《传道书》则根本否定了世界的秩序性,是一部流露出浓重虚无悲观情绪的哲理诗集,神性支点消亡的同时也意味着人性支点在希伯莱民族心理中的崩溃,从而导致精神的全方位没落和虚空,相对于《诗篇》、《雅歌》、《哀歌》,《箴言》、《约伯记》、《传

* 收稿日期:2000-10-09

作者简介:范玉(1974—),男,山东曹县人,菏泽师专中文系助教,学士。

道书》形成的时间最晚，且与《风》一样，不是颂神的显耀，也非纠缠于政治生活之上，而是抒发作为个体的意志和情感，表达一种真正人的声音。总之，《诗经》、《圣经》两种诗歌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可划分为历时性的三个阶段：《颂》—《诗篇》侧重圣的赞颂，人屈服于神；《雅》—《哀歌》《雅歌》侧重政治现实的关注，人被束缚于社会国家之上；《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侧重个体情感意志抒发和人的理性张扬。三个重心随着各自历史境遇的发展逐渐演变，而两个民族的心理特性也随之保持着各自一致的转化，且貌合神离，同中见异。

一、《颂》与《诗篇》

圣与俗分别代表了人心灵需要的两种走向。“圣”带有更浓厚的信仰色彩，是人向一种超验神圣存在实体的皈依；而“俗”有着更多理性支配之下对形而下介入的经验色彩。前者重精神上的超脱，后者更迷恋人世的悲欢。无论《诗经》还是《圣经》诗歌，其精神实质都经历了一个由圣到俗的转化。“圣”形象的退场，神性光环的黯淡是两种诗歌共同的特征。“圣”形象的存在使两种诗歌在颂诗阶段体现出两个民族相似的“圣化”心理趋向。

在《诗篇》中，“圣”形象是上帝，“称谢耶和华乃为美善、万能、尊严、仁慈的上帝”、“几乎所有的宗教教导说：惟有将自己完全投入属天的影响之下，他的灵性才能生长，而终于超越人的限制，人类由于灵性的增长而得到引导与上帝联合”^⑤。希伯莱人是以上帝这一至高至善的完美的一元化道德神为精神的终极归宿。“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悦，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诗篇》16篇11节）在《诗经》中，同样有上帝，只不过上帝化身为“天”之形象，以造物主和历史主宰的双重身份出现。它不像希伯莱人的“上帝”那样成为血肉流贯于整个民族的肌肉之中，也远不如“上帝”形象完整系统。《颂》诗或歌颂祖先或祈祷神明或向先人许诺，其颂之对象集神明、祖先、先人为一体，找到了天之代言人、人之统治者、神人中介的天子—君主。《周颂》中《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等颂文王的英明圣德；《我将》、《武》、《桓》、《赉》等颂武王征伐功绩；《思文》、《载芟》、《良耜》等颂谢神明；《鲁颂》4篇颂美鲁僖公；《商颂》5篇中《那》、《列祖》、《玄鸟》等颂赞祖先，其颂扬的内容也多指向天子君主“功德”。“功”指君主为百姓作出的贡献“绥万邦，娄丰年”

（《周颂·桓》）；“德”指君主作为人君可为后人楷模。“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谥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周颂·桓》）。意思是说文王之德多么光明、纯正。文王以嘉美之德充实我们，我们收聚起来制定法度，让子孙后代忠诚笃行。这里“圣”之形象在圣化意向指引下更多沦落于尘世君主身上，体现为人对君主的崇拜且与之道德水平看齐，而非《诗篇》中人被神异化竭尽全力向神的方向努力。由上可以看出，颂阶段周人心态中世俗性占了主流，对超验精神实体的皈依在更为真实、亲切的人神中介天子君主的崇拜中显得浩淼如烟无足轻重。

颂阶段的《诗篇》体现的却是另外一个状态：

假若崇教是一种被终极眷注所支配的状态，这种状态就不能限制在一个特殊领域，眷注的无条件的特性意味着它涉及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每一空间，每一领域。宇宙是上帝的圣殿，每个工作日都是主的日子，每顿快餐都是主的晚餐，每项工作都是一项神圣任务的完成，每种快乐都是主的快乐，终极眷注就实际存在于初步眷注之中，并使这些初步的眷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从根本上来讲，宗教和世俗领域并不是分离的领域，勿宁说它们彼此都存在于对方之中。^⑥

这段话深刻阐明了圣与俗深层次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希伯莱民族这联系体现得淋漓尽致。宗教与世俗相悖又相合的关系在希伯莱人心理上设置了一个奇异的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形成与崩溃归根结底来自那个民族罕见的苦难历史，对神的信仰和现实难以摆脱苦难两种力量相互支撑又相互拆解，一开始就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性格埋下了种子。浏览《诗篇》中《耶和华使漂泊者定居》、《患病者得疾》、《航海者无疾》等，可看出对神的信仰已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一处。苦难现实促使对神的呼唤和渴求，但把神的呼唤引入现实中并不能赢得独立和自由，他们还需要战争。对神的信仰和现实难以摆脱的苦难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了希伯莱人张力性心理结构。一方面对上无比忠诚“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诗篇》7篇1节）一方面来自生活的经验又促使着迷惑、疑问的产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

我追想这件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诗篇》42篇3-5节)一旦作为“除你之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之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篇》73篇25节)的耶和华对他的子民背过身去,生命在希伯莱人眼里马上显得黯然无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亡,因你的忿怒而惊惶”(《诗篇》90篇7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诗篇》90篇9节)。上帝存在是希伯莱人心理上唯一支柱,趋“圣”成为心灵的唯一走向,希伯莱人把世俗的日子过成神性笼罩的日子,除了走向上帝别无选择。溯其源因为现实的动荡剥夺了世俗安乐美好的一面,而苦难的一面又让他们难负重荷,唯有凭借神的存在而生存。所以,颂阶段希伯莱人心理结构中更多的是神灵之光的流溢,关注人与神之关系,他们心理特性中存在的二元张力结构冲撞消长的制约为以后民族心理的推衍变化规定了大致趋向。而《颂》关注天子君主功德,一开始圣的纯粹就过多的沾上人间的烟火气,落于神人中介的天子君主身上,重世俗中人与人关系的建构,使世俗性在整个民族心理形成之初就得以延续下来,由最初的羞羞搭搭到后来的非我莫属,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二、《雅》与《哀歌》、《雅歌》

《雅》阶段是两个民族心理特性俗化最显著的阶段,也是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

《雅》是周人心理完善成熟的一个复杂阶段,颂阶段有关“天命”、“天赋王权”之类对超验神圣实体的信仰已稀薄近无,而敬拜的君主也不再作为完美的道德化身出场,君主也可能犯错,也要接受批评与指责。《雅》之中大量的劝诫诗,苦口婆心之中隐含着人力对抗神性衰败的努力。不再依靠“神”(君主)来指导人,而是人来扶持帮助天之子,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道德观已酝酿成熟。《小雅》中《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及《大雅》中《板》、《荡》等体现出周人心态的转移。如《板》中涉及矢、君、民三部分,君要从天,但“矢民有言,询于刍蕘”即要向劳动者请教,王意即民意。民的地位即人的地位已从颂诗阶段的屈服地位转为主体姿态。“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是说善良的人是国家的篱笆,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围墙。保佑民族国家的已非先王之德,而是“价人”、“大师”,安宁与幸福要靠民众的力量,对君主的崇拜已转为对民众整体的重视。但另一方面,随着重心

的转移,民众虽已摆脱“神”(君主)的阴影,但却被束缚在政治生活之上,反映到《雅》中便是士大夫的忧心竭虑。《大雅》中《正月》指责幽王昏暴,小人当权;《十月之交》讽刺当权者乱政;《雨无正》忧伤辛勤王事者,受到忌谗;《小弁》讥刺昏王听信谗言,斥逐贤臣;《小旻》指斥掌权者谋事错误,殃民祸国;《大雅》中《民劳》忧民苦;《桑柔》揭示政治贪暴,忧国伤时,这类诗反映当代时政,或怨天子失德,或恨小人当政,或斥奸臣误国,哀怨语中含愤慨,愤慨辞里隐忧思。在周人的心灵中,“神”(君主)的地位已让位于人,但人却负着一具国家民族的重壳,被束缚于政治现实之上,这是世俗性在此阶段从周人身上体现出的一个侧面。

《哀歌》、《雅歌》则构成希伯莱人心理结构的一个转折点。《哀歌》是处在悲惨现实下希伯莱人悲天恸地的呼喊。《诗篇》中崇高尊贵的格调已荡然无存,哀叹一祈求一哀叹,循环往复的心情,无穷无尽的痛苦,当参拜万能上帝的时候,身后是“慈心的妇人,当我民众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食物”(《哀歌》4章10节)和“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哀歌》5章18节)。世俗丑恶的一面压迫着对神的坚定信念,圣与俗的冲突不言而喻。“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开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然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哀歌》5章20-22节),喃喃乞求之中掩不住深深的疑问与失望。

如果说《哀歌》是处在悲惨现实下希伯莱人悲天恸地的呼喊,《雅歌》则是呼喊无助后的绝望恋欢,二者完整地拼凑出希伯莱人在此时期心理转变的场景。“我的爱人,我的新娘,你眼睛的顾盼,你项链的摇动,把我的神魂夺走了。”(《雅歌》4章9节)《哀歌》是痛苦,《雅歌》是欢乐;《哀歌》是追忆,《雅歌》是展望;《哀歌》是上帝遗弃的泪水,而《雅歌》则是上帝缺席的伊甸园,当神性之光迟迟延误,世俗的美好一面的诱惑更显得不可抵抗。现实的不幸让希伯莱人选择了上帝,而不幸的现实又一步步地加剧逼迫他们去责难、发问、寻找另一处更美好的场所。颂诗阶段希伯莱人心中神性—俗性的张力结构此阶段已冲撞到顶巅。

三、《风》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

《风》阶段,周人心理结构已大致定型,最终由神

性的“天”、“天子”落实到世俗性的人自身上。其中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雅》阶段对整体民众的重视又具体到对个体情感意志的关注和理性张扬,体现在心态之中则是个体对一种新道德观的肯定。《唐风·鸛羽》、《齐风·东方未明》、《王风·兔爰》、《魏风·陟岵》、《邶风·式微》、《豳风·东山》、《召南·汝坟》等,虽是反映征战、徭役的诗篇,但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兵役之苦的揭露,它反映出此阶段周人由反抗到觉醒而逐步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国事不如人伦情感之重。“鲸鱼赭尾,王室必毁。吊则如毁,父母孔道”(《召南·汝坟》)意思说鲸鱼摆动尾巴,王命火急催发,虽说官差十万火急,也要侍奉父母照顾家。怀揣王命星夜赶路的士兵想的不是此书牵扯到的军国大事,而是父母的安康。周人更珍惜的是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颂》阶段福祷名利的祈求、《雅》阶段对政治的主人翁姿态已被对爱情的追求、友情的渴望、亲情的依恋所代替。《邶风·静女》写青年男女约会;《郑风·东门之墀》写少女望情人到家;《卫风·木瓜》写男女互赠情物;《周南·汉广》写男子失恋痛苦;《郑风·子衿》写新婚离别,少妇相思;《唐风·葛生》写少妇丧偶痛不欲生,这些爱情婚姻诗重写男女之情,情真意笃,炽热缱绻,反映生活境遇与理想愿望,这种以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和品评为主体的心态及侧重个体情感意志抒发和理性张扬的崭新人格结构随之确立下来。而它所代表的浓烈的世俗性也从此在民族心理中根深蒂固,无论后来异质文化怎样的冲撞与融合,这一特性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正如穆旦所言:“可知在二千年的长时间内,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动,所以我们今天读《诗经》也不觉得有口味不和神怪离奇之处。”^⑦

对希伯莱人而言,此阶段顺承《雅》阶段世俗性的推进,同样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周人对生命肯定和理性张扬是以肯定的姿态出现,而希伯莱人世俗性的彻底胜利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出现。《箴言》论述希伯莱人各种伦理道德的哲理,但“智慧明哲均耶和華所赐”(《箴言》2章)、“敬畏耶和華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章7节);到了《约伯记》,这种“敬畏”开始变成无法忍受。《约伯记》的结局虽然以约伯的忏悔草草收场,但站在约伯立场,谁也无法忍受一个任性暴虐的上帝。这种被压迫的约伯式屈服到了《传道书》中则终于爆发出来,彻底抛弃了上帝,否定了上帝创造的有秩序、有理性的世界的存在,核心概念是

“虚空”: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万事令人厌烦,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直,缺少的不能足数。^⑧

传道者认为,一切都是暂时的,万事万物都在沿着一个既定的轨道循环往复;人生毫无意义,才智与劳碌徒然无用;生命如过眼烟云,唯一的归宿就是死亡。希伯莱民族自民之初卷入战乱,屡受异族统治和掠夺,内无独立,外无强援,只是凭借心目中上帝而战。但是历史并没有给这个民族一个美好的现实,上帝信仰和现实疑问之间的冲突不言而喻。到了《传道书》时期,冲突演化成分裂“罗马人在犹太人历史上出现时,犹太民族正处在发展的最低点,它已丧失了内部团结,而且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放弃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它的全部渴望就是推行强权和征服政策”^⑨当这种偏重世俗的努力再一次消亡于罗马人的屠刀之下,神最终未能出现,世俗美好的一面希伯莱人未能看到,而恶的一面又品尝得太多。所以,虽说世俗性在此阶段也达到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最高点,但希伯莱人情感意志的抒发和理性张扬不得不建立在“虚空”之上,这和周人心态中的世俗性迥然不同。

概言之,两个民族心理之初都具圣化意向,异处在于希伯莱人圣与俗构成了张力结构,而周人则在圣与俗之间找到半神半人的中介—君主。“张力结构”和“君主崇拜”都呈现出圣和俗的意向。由于君主实质仍世俗中人,所以世俗性在周人心理结构形成之初就占有绝对优势且在其后的演进中促进了个体情感意志的抒发、理性张扬并形成了健全的人格,而张力结构造成的难以拆解的框架,使希伯莱人从圣到俗的心理转化中深深地打上了浓重的悲观情绪烙印,走向虚无。

注:

①《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最早见于《荀子·儒效》,这是古今最被认可的分类方法。

②《希伯莱文化》朱维之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③公元前586年南国京城耶路撒冷沦陷于新巴比伦军,

数万国民惨遭掳掠,此即“巴比伦之囚”事件。

版

- ④《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
- ⑤《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 年第 1 版
- ⑥⑨《基督教文化评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

- ⑦《〈诗经〉六十篇之文学鉴赏》珠海出版社,1997 年第 1 版
- ⑧《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 年印发

Transformation from Holy to Popular

——Perspective on the individual national psych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Bible* and *the Book of Songs*

FAN Yu

(Chinese Department, Heze Teachers College, 274015 Heze, Shandong)

Abstract: From the emphases laid by “the Bible” and “the Book of Songs” on praising hol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expressing personal feelings and willpower, the article tries to make a perspective on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from holy to popular.

Key words: becoming holy; feelings and willpower; tension structure; rational publicizing

(上接第 15 页)

注:

①分别见林一安《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世界文学》,1982.6)、张瑞君《哲思·史笔·诗意》,(《名作欣赏》1997,6)等处。

②④《潘石榴飘香》(《“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4)。

③黄锦炎等译《百年孤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9.以下凡作品引证,皆出此版本。

Producing of Spirit and Dancing of Illusion

——One of the artistic discussion of the novel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WANG Yuan-zhang

(Chinese Department, Heze Teachers College, 274015 Heze, Shandong)

Abstract: Marquez wrote the novel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n the way that “a grandmother tells a story”, which is not the way of structural language but a mode of thinking cognition, i. e. the author told the story in the way that the native Latin-American theist know the object. As a result, a variety of spirits and illusions became the subject of a novel, which showed deeply the Latin American’s spirits, and thus a marvellous artistic character formed.

Key words: borrow and imitate; theism; real illusion; unreal illusion; spirit and illusion; realism